

教育社会学视域下高校德育与 学生道德素质培养

何子明, 郭志伟, 朱新洲

(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6)

摘要:高校日益侧重对学生专业知识和实用技能的培养, 融入市场获取自身利益成为大学生普遍的价值追求, 高校德育面临边缘化的窘境。社会化程度低的德育导致大学生道德素质社会化进程的滞后, 德育对象主体性的缺失和德育智育化造成大学生的低参与度和低效能感。高校德育应以就业导向的德育模式的构建为契机促进学生成长为合格的现代公民, 通过对学生生活情境的渗透, 解释和解决学生生活中的道德难题, 推进大学道德生活的持续建构。

关键词:高校德育; 道德素质; 德育困境; 公民道德教育; 德育生活化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884(2014)07-0099-04

培养和健全大学生素质, 是高校办学的重要目标之一。道德素质在大学生的整个素质体系中居于基础地位, 对大学生个体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价值。诚如威廉·洪堡所言, “大学是社会的道德灵魂”^[1], 高校不仅要为大学生提供知识能力平台, 还要为社会孕育道德资源, 是知识传授的机构, 也是道德习成的场所。总体来看, 高校德育工作效果并不理想, 与之相应的是, 有关这个主题的讨论和实践依然存在深度和效度的局限。

考量特定的社会场景和复杂的结构脉络, 对于高校德育及大学生道德素质培养这一主题的研究, 将会在“社会—学生—高校”这一整体框架中得以明晰。这是笔者运用教育社会学视角, 审视高校德育及大学生道德素质培养的理论初衷。

1 失衡: 高校德育的边缘化

应该说, 作为高校工作中的重要环节, 培养大学生道德素质的德育并未缺席。遗憾的是, 一方面是德育在场的事实, 另一方面是德育在高校工作中遭遇边缘化的现状。如何解释这种尴尬的矛盾状况? 无疑, 就大学论大学、就德育论德育的分析路径只会半途而废, 必须超越这种陈旧的狭隘讨论, 将高校德育的相关主体置于宏大的社会关联框架中予以剖析。

马克思主义认为, 道德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所决定的, 人们的道德观念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择取的。当前, 我国正处于全方位多层面的社会转型期, 社会价值体系重建相对经济体制

改革步伐缓慢的差距, 客观上造成道德失范现象的衍生, 必然对大学生道德素质培养形成冲击。面对社会急剧变迁, 国家意识到强化高校德育工作的重要性, 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 明确指出学校教育要坚持以育人为本、德育为先, 要以基本道德规范为基础, 着力培养大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文明行为。

从某种意义上说, 大学道德教育正当其时, 社会转型为大学发挥社会功能提供了契机: 高校可以在价值规范体系更新进程中为大学生提供道德教育资源; 国家对大学生道德素养的重视, 也为高校德育工作提供了政策保障。然而事实表明, 大学道德教育与大学生道德素质培养并未顺理成章得以优化。这意味着上述考量仅仅看到高校德育的机遇空间, 却忽视了这一表象背后多因素交互影响的复合逻辑: 大学从来不是一座空中花园——“象牙塔”这一标签已被中国当前社会变迁的浪潮冲刷得无迹可寻——而是建立在总体性的国家、社会 and 人的需求预设的基础之上。

其一, 德育是国家对高校多种教育功能的预期之一。大学教育在国家意识形态的指引下还承载着政治、经济等多种社会功能。改革开放前, 道德教育成为政治教育事实上的附属品, 改革开放后,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和市民社会的浮现, 政治意识形态逐步松绑, 大学道德教育也随着大学政治教育的相对弱化而有所动摇。尽管近年来国家重新强调高校的德育功能, 但收效甚微, 主要缘于两点原因: 一是德育数十年来因缺乏独立内容导致的附属

性和空心化,难以应对社会急剧变迁,完成其在大学诸育中的重构;二是市场经济的深入拉伸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国家难以完全控制社会实体合法前提下的具体行为,侧重本单位利益的权宜性行为大量出现。这种情况在高校教育工作中也普遍存在,德育工作不再象改革开放前那样上施下效,往往是看似轰轰烈烈,实则处于“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尴尬处境。

其二,高校作为社会机构,不仅要履行满足国家、社会其他部门、学生个人等外在利益需求的功能,还有自身的利益诉求。当前,市场成了社会的主导性要素,大学未能从逐取功利的大潮中抽身上岸,除了满足国家对其社会功能定位之外,“大学越来越经常地被喻为服务站”^[2],已经成为社会现实的适应者和世俗要求的提供者,如何高效培养满足市场需求的人才,俨然成为大学的终极使命和主要职能。这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高校培养人才的模式和方向,愈来愈侧重对学生专业知识和实用技能的培养。加之如今高校办学侧重点是教学评估、科研产出、学生就业率和考研率等可以量化的硬指标,于是,道德教育和价值构建作为高校办学质量评价中的软指标就处于被冷落的边缘地带,沦为一种附带品。

其三,作为高校教育的对象,大学生理所当然有对高等教育的预期,而学生的个人教育期求在根本上受制于社会的形势和需求。市场经济的扩张和功利主义的震荡致使部分大学生价值取向迷失,显露出了重实用轻品性、重个体轻公共的端倪。理想信念、生存意义、终极关怀等语词,逐渐从大学生的日常词典中消逝。再者,社会竞争的加剧、就业形势的严峻、高等教育目标的调整,对大学生的教育期求和价值选择产生了决定意义的影响。注重实用技能提升与追求生存空间拓展,成功融入市场达致自身利益最大化,成为大学生最主要的价值追求。在此目标下,大学生价值观念趋向务实,不断强化自我意识与效益观念,积极参加各类职业培训和资格认证。于是,形而上的精神追求被束之高阁,大学生为自我意识的高扬和道德感的式微找到了理由。

上述讨论展示了当前高校德育和大学生道德素质培养日益边缘化的窘境以及这种遭遇的内在社会逻辑。这些解释的价值在于,它们引申出这样一系列问题:在市场力量强大的社会转型期,大学如何说服自己将德育置于多种教育的核心圈?如何说服学生心悦诚服地接受道德教育?面对这些拷问,大学德育必须作出回答。回避、敷衍乃至答非所问,都将进一步加深大学德育边缘化危机。

2 断裂:高校德育的症候

对社会转型和德育边缘化带来的挑战,众多高校并非熟视无睹,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作出了回应。然而,大学德育与大学生道德素质培养现状依然不容乐观。要探究其中原委,必须剖析高校德育工作实践的症结。

2.1 高校德育与社会生活的断裂

现代大学作为开放性组织,与社会的联系千丝万缕,就其教育对象而言,源于社会,朝向社会。建构一种教育

与社会良性接轨的关系至为关键。大学也正在努力以社会需求为重要风向标,调整教育目标、内容和模式。从分类的眼光来看,大学在知识教育、技能教育、道德教育几个层面上出现了分野:市场经济时代的社会需求与高校和学生对这种需求的认知和认同,致使知识教育以及技能指导成为高等教育的主流内容,较好地实现了与社会的接轨;高校德育面对急剧变迁的社会及其衍生的纷繁现象则多少有些手足无措。

不难发现,下述两种思维和举措在高校德育工作中最为常见:一种是不加反思地看待社会的变化和需求,片面认为社会转型奉行功利主义哲学、市场时代奉自利为主臬,而道德、道德教育、道德素质对于社会、学校、学生皆无足轻重、无可作为。这种“德育无用论”理念在实践工作中的应用,有意无意将德育推向了高校教育的边缘位置。其直接后果是:道德教育虽然在场,但未归位,并没有开发社会变化带来的德育资源,而且对发挥大学德育烛照社会方向和提升学生素养的功能无动于衷。这种做法与其说是附庸社会浊流,逃避大学对社会发展应尽的职责,毋宁说是切割大学德育与社会生活之间的正向关联。另一种则与之相反,没有直面丰富的社会生态,而是选择闭门造车式的道德教导。一些大学未能辩证地认知社会转型的多维性,只看到大众文化的负面效应,没看到市场社会所蕴含的正面道德因素,将社会变迁带来的种种事实视为洪水猛兽,唯恐避之不及,拒斥丰富的社会生活对高校德育的介入,在德育理念和实践更新方面无所作为。于是,道德教育照旧——德育目标上,“只注重‘好学生’的培养,而忽视‘好公民’的教育”^[3];德育内容上,教授的道德理论规范较为陈旧,回避社会复杂的道德事实;德育方法上,重灌输说教、奖惩规训,轻社会实践、价值辩论。这两种德育对策造成的后果是:社会领域里的道德现象反证着高校德育实践的低效,社会化程度低的德育导致主观上大学生忽视自身道德修养,客观上也导致了大学生道德素质社会化进程的滞后。

2.2 高校德育与学生生活的断裂

从某种意义上说,高校对社会转型期特有道德现象的疏离,可被视为对大学精神的一种局部维护。让人遗憾的是,在这一前提下,高校德育同样未能紧密对应培养对象的生活实际。

首先,是大学德育对象的主体性缺失。近年来,“双主体”说在理论界渐盛:作为教育对象,大学生并不仅仅是教育客体,而是和学校同属于教育主体。作为教育主体之一,学生的主体性理应得到发挥。然而,实际工作却远远滞后于前沿理论。学校单方面充当了德育工作的规则制定者和实施者,德育过程也呈现出明显的单向性,传统德育的教导、榜样、规约等方式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倡导学生主动选择与积极创造的德育范式尚未成型,学生依旧处于客体位置和从属地位。德育对象主体性的缺失造成学生的低参与度和低效能感,致使大学德育劳而无功,道德教育充其量“只能使学生说什么、不做什么、做什么、不做什么,却无法迫使他们想什么、不想什么,换句话

说,灌输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人们的行为,但不能从根本上转变人们的观念”^[4]。

其次,深为学界诟病的德育知识化、技术化现象仍然在高校普遍存在:在内容上,高校德育异化为以知识传授为主的知性德育和以理论推演为主的思维德育;在形式上,高校德育异化为以课程为导向的教材德育和以考试为导向的应试德育;在功能上,高校德育将自身异化为工具手段,将主体异化为工具对象,教师成为传授道德知识的工具,学生成为接受知识的工具。这些处理最严重的弊端是道德教育较少朝向广博的学生生活世界,较少从中汲取丰富的道德素材,较少针对其中的失德行为。其结果必然是知性内容被抽取出来作为德育的全部范畴,道德教育成为理论文本的宣示,孤立于教育对象的生活世界之外。从本质上看,上述现象表征着德育被技术性地转换为智育,“德育的过程向智育看齐同样也成为单一的知识获得的过程。它向学生传输的是被普遍化和客体化了的道德知识,……这种知识抽去了具主体生命表征的内容,它无视人的情感和态度,鄙视直觉与体验,它将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放逐出外,以显示它的客观和科学。”^[5]

3 整合:高校德育的路向

对于高校德育现实处境与主要症候的分析,是一种避免简化论而试图检视复杂关联性的解释。为了避免高校德育之路越走越窄,我们必须解决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如何处理关涉大学德育的多重关系?答案的前提是,正视和承认前文已述的关系现状。因此,优化高校德育和大学生素质培养绩效的途径同样是多维而非单维的。

3.1 德育实践化,整合高校德育与社会需求

显然,现代大学无法遗世独立,高等教育大众化与强化大学满足社会发展职能有内在的逻辑关联。大学德育当然也不能置身其外,既不可能脱离社会环境的影响,也不能规避社会的需求,同样不能推卸纠正社会偏误价值观念的责任。

听任社会价值流变的观念或画地为牢式的自我构建,都对提升大学生道德素质无所裨益。科学认知社会现状以及大学德育应有功能成为首先要明确的问题。不可否认,市场经济改革引致的社会转型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功利主义的泛起和道德价值的失范,然而也应看到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所蕴涵的道德资源——理性、务实、开放、自由、平等、契约、信用,而依随市场经济深入而逐渐壮大的公民社会更倡导依法守法、公平竞争、维护公德等文明规范。新时期大学德育模式的建构,应着眼于社会发展对学生道德素质的要求并通过提高学生道德素质促进社会价值观念的更新优化。这种以两者相互促进为逻辑起点的教育,要求我们以社会事实和学生发展为依据改进工作。

由此,作为当今社会对其成员的塑造期求和“准社会人”大学生的发展目标,“公民”应成为大学道德教育的核心概念,公民道德应成为大学道德教育的主导内容。事

实上,这既是国际的前沿理念,又是国家的新近方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0年10月在巴黎召开的首次世界高等教育大会明确提出,高等教育首先要培养高素质的毕业生和负责的公民;欧美国家的公民教育同样在大学教育中占据重要位置;《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规定,大学德育教育要与公民道德建设接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指出,要对大学生深入进行公民道德教育,引导大学生自觉遵守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新时期大学德育应在培养遵规守纪的好学生的基础上培养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好公民,即教育学生在理性维护个体权利的同时自觉承担社会责任、遵守社会公德,重点培育学生的公共意识和公共精神。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大学德育须直面社会,关注社会民生,及时更新与社会生活紧密关联的鲜活内容,建构解释大学生关注的社会问题的框架,促进学生在深刻认知社会的基础上成长为合格的现代公民。

以上勾勒出的面向公民社会的大学德育的对策,仅仅构筑了一个宏观和抽象的框架。我们可以借助就业为导向的德育模式的构建来填充这一思路。在当前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市场经济潮涌的背景下,就业一定意义上成为大学教育的旨归。不少高校把育人眼光停留在功利的短期效用和单纯的工具理性层面,完全以市场需求强化相关知识和技能培训,产生了就业教育冲淡了道德教育效果的误解。其实,两者是并行不悖的,且应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就业作为大学生从高校走入社会成为公民的基本途径,同样可以成为高校培养具有现代公民道德素质的大学生的切入点。就内容而言,就业需求为导向的高校德育以职业道德教育为核心。它从两个层面提升大学生道德素质:个人品质层面培养大学生的责任意识、敬业精神和吃苦耐劳的本领;公德意识层面培养大学生的公共观念、团队精神和协作能力。就形式而言,就业需求为导向的高校德育以“面向社会,双向参与”的开放型德育模式为主导。外聘或邀请校外各行各业精英为学生传授职业道德常识和经验,重点建立校村共建、校企合作等各类社会实践基地,扩展学生社会实践载体,引导学生在丰富的社会课堂中体验、认知和历练道德素养,为顺利就业奠定品格基础。

就业为导向的道德教育与大学生公民道德教育本质上是一致的。这种德育模式既遵循国家对高等教育的定位,又满足社会对高等教育的要求,而且符合学校与学生的共同利益,务实有效,当能成为高校德育有所建树的重要走向。

3.2 德育生活化,整合高校德育与校园日常行为

学生生活是道德素质塑造的主场域,回归生活是大学道德教育走出困境的现实路径,植根于生活世界的道德教育才能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发育德行。

德育生活化的首要任务是学生主体的参与,发挥大学生在高校德育中的主观能动性至关重要。在道德教育内容的遴选、道德教育方式的择取、道德实践方案的拟定

等方面,学校应通过学生代议等渠道将学生意见充分纳入其中,促使学生自主、自觉、自愿、自为地参与德育实践活动。换言之,“大学德育须以交往与对话为基本方式,培养大学生良好的道德修养”^[6]——这种观点无疑受到雅斯贝尔斯“激发精神生活是大学的重要价值,交往是激发精神生活最有意义的手段”^[7]的启发——通过学生与学生、学生与教师多主体间在校园生活中的互动、合作、体验,使学生生成道德情感、内化道德认知、强化道德信念、养成道德行为习惯。

德育生活化还要求扭转知性德育的现状。高校德育不能只向学生传授道德知识,而是要促进学生道德实践,成为知行统一的具备较高道德素养的人。据此,大学道德教育不是道德概念的抽象教导,而是面向生活世界的立体网络。在特定的德育课程之外,必须开展紧密联系学生日常生活的道德实践,而这种实践也不能局限于应景式或运动式的特定活动,必须与校园生活融为一体,通过对学生学习、生活各种情境的渗透,扩展和深化道德教育和实践的范畴,“将学校道德教育过程改造为道德生活过程,赋予现实生活世界以个体德性生成的本体论意义。”^[8]只有这样,大学道德教育方能彰显其题中应有之义:大学道德生活的持续建构。

确切地说,道德教育向校园生活世界的回归有许多具体工作可为:寝室文明建设、劳动周环卫、文明交往礼仪、志愿服务、社团活动,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些校园道德建设举措不可或缺,都着眼于围绕校园常规活动开展学生的道德养成训练,然而却忽视了这样一个关键点:大学生的道德素质提升越来越深深地根植于对价值择取的自我认知的冲突性关系中,并非是在真空中习成和建构的。这就要求我们直面那些引发学生道德知行矛盾的实际问题,更为深刻地检视学生置身其中的含糊作为。比如,考试舞弊屡禁不绝、毕业生拒不交还助学贷款、奖助学金评比过程中的相互攻讦,类似的诚信意识和公共价值感缺失的事件在大学里时有发生,严重解构着校园道德秩序。对于这些本应成为道德教育与管理中的鲜活资源,高校相关理论工作者和行政人员的反应却相对迟滞,有意避讳甚至无动于衷,仍然照本宣科,其效果可想而知。对于校园生活实践热点难点问题的及时回应和切实解答,是大学德育无法回避的议题,否则这种道德教育本身的道德属性就值得质疑。正如赫舍尔所言“没有哪一个真正的难题是从纯粹的寻根究底中产生的。难题是处境的产物,它是在处境艰难、理智困窘的时刻产生的,是在经历到不安、矛盾、冲突时产生的”^[9],考试自律、助学贷款归还、奖助学金评选等大学生在现实生活中遭遇的道德难题是道德教育生活化最真实的道德生活情境。高校德育工作者应实事求是地应对现实的道德难题,挖掘道德困境的教育价值,通过主题班会、团日活动等形式,大张旗鼓地倡导学生充分论辩,作出理性的道德判断和价值澄清。一种有效的道德教育首先要对教育对象生活

中的道德难题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和解决,否则无论理论传授如何博大深刻、实践活动如何丰富热烈,也是一种低效、无效甚至负效的德育。目睹这种形式主义的道德教育,学生就难以将道德知识内化为道德信念,每当置身道德两难境地时,知行不一的现象就难免发生。

概而言之,道德教育的终极目的是“行”,大学生道德行为良莠是衡量德育成功与否的最终依据。“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0],德育的生活性必然要求德育具有实践性;同时,德育的实践性也意味着大学生道德的实践过程也是其道德生活的过程。德育的生活性与实践性密不可分,实践化和生活化的德育模式是大学道德教育的必然出路。德育实践化和生活化的对策并非万能药方,对于高校而言,这剂良药本身即是一种严峻的考验。在此过程中,高校需要均衡、稳健、科学地强化德育的实践性和生活性,排除功利性的、权宜性的、表象化的道德实践活动,正视和解决若干难以回避的矛盾和冲突,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大学道德教育的价值得到磨砺。大学德育与社会现实、校园生活、诸种教育的融合过程是漫长而艰难的,从长远来看,“办大学就是要办一个氛围”^[11],旨在育德化性的德育,只有在大学校风和文化营建成功之时,才能真正可持续地优化大学生道德素养。

参考文献:

- [1] 睦依凡. 大学使命:大学的定位理念及实践意义[J]. 教育发展研究,2000(9):19-21.
- [2] 孙峰. 大学教育的追求:知识与道德的整合[J]. 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42-44.
- [3] 廖小平. 大学德育中的“学校人”与“社会人”——当代大学的德育目标辨析[J]. 教学与研究,2004(5):78-79.
- [4] 鲁洁,王逢贤. 德育新论[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
- [5] 鲁洁. 边缘化外在化知识化——道德的现代综合症[J]. 教育研究,2005(12):13-15.
- [6] 文艺文. 大学德育路径生活化[J]. 道德与文明,2007(5):71-79.
- [7] (德)雅斯贝尔斯. 什么是教育[M]. 邹进,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1.
- [8] 曹树真. 关于学校道德教育重建的思考[J]. 教育研究与实验,2006(1):23-25.
- [9] (美)赫舍尔. 人是谁[M]. 隗仁莲,译.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1] 刘献君. 大学之思与大学之治[M].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0.